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篇章

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分成许多篇章。而绝大多数篇章的标题，离不开两个大字：战争。从鸦片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和战争中，走过了将近一百年。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抗日战争看做关键性的一章。

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战争打响，日本当权势力中大部分人沉浸于一片乐观之中。他们确信日军只消“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

* 载《人民日报》1987年7月6日。

陆相杉山元奏报天皇，事变能够在一个月左右解决^①。参谋本部制订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第29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②，陆军省的首领和幕僚们，确认中国是一个不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内阁里面一些文职大臣也主张乘机把中国军队势力彻底打垮^③，迅速全部征服这个西邻弱国。在中国方面，国民党阵营的“知日派”和其他民族失败主义者，也恰恰持同样看法。被人称做蒋介石“宰相”的张群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④。胡适说，中国为一中世纪国家，断然不能抵抗近代国家的日本，必须认清战争后果。他除了与高宗武等所谓“南京青年智囊团”商定“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又面见蒋介石陈述自己的主张，并力荐高宗武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⑤，为求降讲和留下后路。日本侵略

① 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东京1976年版，第606页。

② 白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东京1964年版，第9卷，第17—18页。

③ 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东京1981年版，第97页；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下册，第620页。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85页。

⑤ 胡适：《胡适日记》，中华书局本，下册，第576—577页。按：中华书局本《胡适日记》残缺。J·H·伊尔所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曾引胡适7月6日《日记》，中华书局本无此。胡适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另有所记。又，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98页。

者、中国失败主义分子，关于中日战争前途的预断，出发点不同，结论一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都根本不放在他们眼里。

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为抗日战争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显著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正面战场上的攻势达到了顶点。二是敌后战场开辟形成，并且迅速壮大起来。在正面战场上，先后经历了山西忻口、淞沪、台儿庄、武汉等几个大的战役。7 月 27 日，日军向华北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日军随即分兵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进犯。8 月 13 日，日本海陆空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开始。日军陆续投入 12 个师团约 30 万兵力，打了将近三个月，占领了上海。日军乘势向西推进，12 月 13 日进入南京。国民党 15 万大军，在一片混乱中溃败。华北战场上，八路军出师告捷。9 月 25 日在平型关一战，歼灭日军坂垣师团 1000 余人。平型关之战，表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勇气和力量战胜一切凶悍敌人，它及时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从战争初起到 12 月底，半年时间里，敌人在华北已经占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各省，在江南则占领了京、沪、杭地带。1938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初，中日双方会战于台儿庄。日军遭受重创，死伤近 2 万人，中国军队也随即后退。日本企图迅速结束战争，集中 12 个师团兵力，近 38 万人，分五路直扑华中重镇武汉，又从南面进攻广州。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21

日广州也告失守。武汉战役还在进行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即向军令部次长表示，即使攻占了武汉、广州，中国也不会屈服。日军被拖到中国内地去，对日本非常不利。“一定要迅速实现和平”^①。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占领武汉后，也认为“这并不等于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而且“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也使我心情忧郁”^②。武汉、广州战役结束时，日本摆在中国关内战场上的兵力达24个师团，近100万人。国内空虚，仅留下了一个近卫师团留守。在这个阶段中，日本占领了中国主要工业城市和富庶地区，封锁了主要海港。从战役上看，它是胜利了。但从战略的全局看，它极大地失败了。日本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武汉战役结束，全部正面战场的高潮已经过去，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却在整个战争中突出起来了。

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与国民党军队从正面战场上像潮水一般溃退同时并行的。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八路军115师一部驻守五台地区，创立起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的各一部分。120师一部坚守在晋西北作战，不久与共产党领导的绥远武装力量汇合，建立晋绥根据地。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率领129师开赴太行山前线，转战于晋东南、冀西、

①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东京1952年版，第8卷第103页。

②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369页。

冀南、鲁西北、豫北的广大地区，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济南和山东其他一些地区沦陷后，共产党就地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政权。1939年春，八路军115师一部挺进山东，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根据地相继建立。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指挥共产党领导的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福建、广东各地的武装，建立华中根据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支持下，这些根据地的抗日武装日益壮大，他们英勇战斗，深入到敌军占领的城市附近和交通线上。这迫使日军必须把相当一部分兵力分散在辽阔的敌后战场上。最初他们还企图掩饰敌后战场的严峻形势，很快就承认必须集中大力来对抗抗日根据地作战了。1938年9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对前来视察的侍从武官说，八路军游击队“十分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不祥事件不断发生。恢复治安的地区实际只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千米之内”^①。1939年12月，日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报告：“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也深入到了民众之中。”在山东方面，扩张更为剧烈^②。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指出，“以后，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②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127页。

华北治安战之癌就是中共及其军队”^①。1941年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报告说：“本军除图谋一扫黄河以北的中央军势力以外，主要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毁灭战”，剿共是肃清的主要目标”^②。武汉战役以前，日军主要在正面战场作战，在那以后，日军同时要在甚至主要在敌后战场上作战了。抗日战争这时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抗日根据地抗击的日军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日军的64%，伪军的95%。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一直绵延到反攻开始。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加紧诱降活动。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人叛逃，以后并“还都”南京，同样挂着国民党招牌，成立傀儡政权。正面战场上的日军这时也发动了一些规模不等的进攻，如南昌、长沙、中条山等战役，都限于占领局部或小块地区。1941年12月，日本要求“解决中国问题”更加迫切，挑起太平洋战争，强化所谓南进态势。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接连发起中原、湘桂等战役，打通了平汉、粤汉、湘桂各路全线交通；在敌后战场上，频繁进行“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战争总的形势。这时，日本艰难挣扎，四面楚歌，失败已成定局。它在太平洋战争

①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② 《华北方面军多田司令官的报告》，[日]《日中战争》2，《现代史资料》9）1964年版，第718—720页。

中，最初因偷袭珍珠港，获得“赫赫战果”。第二年美国开始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最后战火燃烧到了日本本土。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合击下，日本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8月15日，日本向盟国电发投降照会。9月9日，在南京严肃地举行了中国战区投降仪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失败收场。这是长达100年的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外国侵略战争头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每次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和交涉，其结果，不是割地赔款，就是被强加给种种新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如中法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内阁倒台，最后照旧签订不平等条约，葬送中国西南边疆种种利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出兵山东，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结果仍被迫接受日本对山东的占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第一次洗刷了中国人民上百年所受的奇耻大辱。然而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无比高昂的。抗战连续八年以上，敌军铁蹄践踏遍多半个大好河山，这真是书契以来所未有。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以上，财产损失约1000亿美元。和平居民所遭受的残暴屠戮污辱，至今来读当时的报纸和有关记录，仍令人毛骨悚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中国民族所蒙受的灾难是深重的。至于是谁加给了中国如此深重的灾难，我们一向区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在这场不义之战里，日本人民也

深受灾难,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牺牲品。

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能分开。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主要靠的中国自己。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首先是倾注最大力量来征服中国,妄图一举把中国变为东三省那样的日本殖民地的。1939年12月28日,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大臣联合制定的《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规定:“处理中国事变应根据既定的基本方针。……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工作为中心”。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其中确定,对苏联要做到日苏“平静无事”;对美国要促使它们对日本“处理(中国)事变采取赞成态度”^①。日本的重兵也一直部署在中国。据日本战史《关东军》、《大本营陆军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大东亚战争全史》等书公布的材料,“七·七”事变前日本常设陆军师团为17个,事变后屡次增加。至1945年,陆军师团共168个。它们历年分布在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最多的年份占94%,最少的一年,占35%,八年中,平均每年占76.4%。“八·一五”以前,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日军,仍多达105万人^②。日本是用最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3年版,《文书》,第421—424页。

②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7期载邹南星《从日本陆军兵力分布看中国战场的地位》说,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在华陆军28个师团,34个混成旅团,总兵力105万。前引《大东亚战争全史》等书,一般只计师团,未计独立的旅团。师团数与兵力数很不一致,更准确的数字尚需进一步查考。

大力量来侵略、征服中国的，中国是主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反法西斯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基本事实，就是如此。

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近代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都以投降屈服告终，抗日战争开创历史记录，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内部形成了新的团结，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了。尤其在人民中间，这种团结觉醒的程度，是以往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哪一次能够比得上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大举入侵下，中国面临亡国危险。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一面是客观的凶险逼迫，一面是人民的主观抗争，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觉醒表现在一系列的行动上或动向上。

首先，代表中国两大对抗势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十年内战流血转为重新合作，并且以此为中心，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早在被“围剿”中，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各种努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放弃“反蒋”口号，同年

12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凡此种种，都是共产党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日的重要步骤。战争爆发，加快了国共两党靠拢的进程。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重申了关于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保证。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一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在列强的进攻下，不敢依靠人民去抵抗侵略，一味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愈演愈烈。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最初十年，是“剿共”与新军阀互相厮杀，进行双重内战的十年。日本侵略者在这个时间里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制造了一个“华北特殊化”，华北眼看就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了。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同全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抗日，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大转变。国共合作促进了国内各阶层、各民族共御外侮的实现。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鲜明标志。

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不是“七·七”事变这一天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抵抗日本侵略，开展救亡运动，至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在发展。参加救亡运动的有大批知识青年，也有其他群众。他们各自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战争爆发，民气空前旺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立即卷进了抗日的洪流。他们的情况不同，选择道路不同，奋发敌忾精神是一样的。

农民群众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里，到处自己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河北、山东等地，各种名目的农民自卫武装风起云涌。它们竖起“抗日自卫”、“剿匪、抗日、保家、卫国”大旗，号召群众。农民争先恐后参加。例如鲁西北范筑先鲁西抗日军短时间猛增至二、三十万人。冀中马本斋回民支队、冀南赵辉楼民众自卫抗日军都迅速壮大，发展成了抗日劲旅。延安成了先进青年向往的圣地。万千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那里。他们之中，有远从侨居的东南亚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千山万水而来的。这些青年经过短期学习后，很快走上抗日工作岗位。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浙江、广州、武汉等一些高等学校，迅速往后方迁移，分设于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等地。许多学生、教授分别长途徒步前往。据说当年拿破仑大军人侵德国，歌德和哲学家费希特在敌军的围城中照旧安心读书写作。后来德军攻入法国，占领巴黎，自然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也拒绝离开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专心于细菌研究。中国以前有人利用这些“美妙”故事，来宣传“读书救国论”、“科学救国论”，阻止青年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抗战开始，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说明他们的爱国心不是什么巧妙宣传可以抵消得了的。也就在同一个时候，一部分实业家、工厂主，抱着“为宗国效

力”，“誓不以厂资敌”的热忱，在敌机狂轰滥炸，运输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拆卸工厂设备，往内地迁移。1939年以前，从华北、华东、华南迁至西南、西北地区的估计约一千四、五百万人。这种迁徙有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密切各族人民间的联系等方面的意义。它的主要意义，和大多数人在敌后坚持抵抗斗争一样，是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克服困难，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

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抱着一口吞下中国的野心。日本的工业水平、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日本侵略军又带有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很大野蛮性。这一切，决定了战争必定是残酷的。中国人民在残酷战争的现实面前，显示出了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

无论从整个民族看，还是从多数个人看，情况都是这样。在战场上，战士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他们像《义勇军进行曲》所激昂高歌的那样，“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去抵挡敌军炮火，挺身拼杀。实际的长城在炸弹大炮轰击下很容易摧垮。中国人民用几百万到两千万人的血肉筑起了一条始终摧不垮的长城。他们的肝胆血肉不止涂炭在中国土地上，也涂炭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牺牲精神！敌后战场上的人民战争，尤其表现了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在战场外面，古人以为难得的“毁家纾难”这时成了很平常的事。郭沫若记载“七·七”一周年武汉支援抗战的一次“献金狂潮”说，

五天之中，武汉三镇参加献金的在 100 万人以上，献金总额多达法币 100 多万元。献金的从富人到乞丐，什么人都有。许许多多穷苦的人不止献一次两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 100 多万元的数目，很大部分是靠着这些贫苦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①。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我们就不会用现在的眼光去小看那一两角、一两分钱。须知那是衣食无着的贫苦的中国人，除了血肉之躯以外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牺牲。一个优秀民族，必定是又智慧，又勇敢的民族。当它需要付出牺牲以求得生存和光荣的时候，人们就敢于去实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把觉醒变为自我牺牲，无数事实，令人可歌可泣。它们强烈地表现出中华民族不愧为优秀的民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

上一个世纪 80 年代，外交家曾纪泽在伦敦《亚洲评论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睡与醒》(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说中国人暂时沉睡，往后会醒过来。也就是所谓“先睡后醒论”。但是那以后相当久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觉醒。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认真的教师。中华民族这个观念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不已，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疆域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的觉醒自然不会那么整齐划一。事实告诉我们，抗日潮流兴起，中华民族这个观念确实成为最

^① 郭沫若：《洪波曲》，第 92—94 页。

大的凝聚力量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从睡梦中醒过来了。

社会历史运动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同。它有长期起作用的，有只在短期起作用的。环境条件改变了，短期起作用的规律也就跟着改变。何况如何判断事件，往往只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愿望，与规律性联系不到一起。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为了推卸失败罪责，说他是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根本缺少反侵略意愿的清政府，本来只想侥幸取胜，不行就妥协投降。抗日战争中，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成了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本侵略者的对手，再也不是甲午战争中的清政权，不是二十一条时的袁世凯统治，不是“九·一八”中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了。日本侵略者现在的对手，是一个由共产党发挥伟大作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是全中国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彻底破除了日本军阀和中国亡国论者们的“中国必败定律。”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变化

自然界现象中，地壳每逢大震动，总要引起一些生物产生异常状态。抗日战争引起的全中国社会的反应不下于一次大地震。对外它是一场规模罕有的军事大较量，对内它是一场强烈震撼社会各阶级，使它们改变原来态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巨大政治运动，政治大变革。整个战争期间

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势力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

先看蒋介石国民党所发生的变化。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的承认、拥护。它这时有两面作用，或双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着革命性的，在国际上说是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又一面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抗日需要和民族利益，后一面不利于抗日战争，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武汉失守以前，它抗战是积极的。尽管那是不肯动员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也比不抵抗主义进步，是在为保卫祖国面战。政治上，它这时主要是拒绝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提供了若干改革的诺言。共产党和其他政治派别对那些诺言履行的可能性也予以相当希望。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在政治地位和实力地位上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的。可以认为，由于这些情况，在蒋介石国民党全部 22 年统治中，那时它达到了值得称赞的最高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迅速逆转。前一面的作用、前一重性格衰减下去，后一面的作用、后一重性格加强起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是几次反共高潮，并没有把抗日革命势力压下去；相反，在共产党和人民的有力反击下，蒋介石又不得不被迫有所收敛、退缩。“皖南

事变”以后，蒋介石发表一篇“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反共演说了事。1943年大军“闪击”陕甘宁边区不成以后又发表一篇演说，声称共产党问题纯属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反共讨不到便宜，反而落得丧失人心。反一次，它的政治地位下降一次，继续反，继续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政权一直希望的取得外援，增强实力，夺取胜利果实，似乎可以稳拿了。实际上，这时它像贮藏很糟的苹果，从内部发生的腐烂正在日益恶化。政治上独裁，特务横行，军事继续溃败，人民生活痛苦，蒋家亲党乘势发国难财。据经济学家马寅初估计，单是孔祥熙在抗战中期拥有的资产就多达上10亿美元，地产分布于南美巴西等地。美国人写的书上说，1944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4700万美元。控制党、政、军、财大权的陈立夫兄弟、何应钦、孔祥熙等在国民党内外成了人们反对的众矢之的。蒋介石本人也受到众口交责。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浮动，怨声载道。1943年，美英等国宣布废除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在对方完全是惠而不费之举，在国内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赢得的一次胜利。蒋介石特地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大量篇幅讲不平等条约的危害，宣传“平等互惠新约”的重要性，和断言现在、未来的中国之命运，只能依靠戴上“三民主义”帽子的他本人和国民党来掌握、支配。它的意义，一是把自己打扮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领袖”，压制人民反对；一是强调重申中国必须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走旧中国的老

路。就在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统治腐朽衰败的严重性，也被因利害关系密切的美国所注意到，由一批外交官、新闻记者的报告和新闻报导揭露出来，纷纷加以指责。他们肯定：“重庆目前仍有政治腐败与保守主义等现象，蒋氏大权独揽，其地位与昔日之帝王相同。彼所领导之国民党，现为主张由国家统治个人思想之陈氏兄弟所把持，此种主张如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未必完全不符”^①。后来蒋介石与美国为了是否继续任用史迪威问题，经过激烈争论，美国总统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任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蒋介石利用美国援助，装备起了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庞大军队。但政治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更加暗淡了。国民党内部重新有人准备武力倒蒋，驱赶蒋介石下台。

蒋介石国民党的变化——在全国和世界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双重性格中，后一面远远超过前一面。政治地位从高峰下落，一部分人还迷信蒋介石，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声名狼藉，信誉扫地。

再看共产党这时发生的变化。

共产党是在它 16 周岁的时候进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在这以前，它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和锻炼。抗日战争开始，共产党有约 4 万党员，3 万多人的军队。到 1940 年，即抗战经过三年以后，党员增加到了 80 万，军队增加到了近 50 万。1941 至 1942

^① [美]《星期晚报》豪塞尔 (ERNEST E. HANSEN) 评论。

年间，由于日军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缩小，八路军人数减少。但在那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和武装力量又重新扩大、发展，扶摇直上。这种发展的每一个前进，都要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打退日军的占领，摧垮敌伪政权才能实现。一面要抵抗日本侵略，一面又要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裂投降活动。同前面经历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共产党这时更加成熟了。实际上，应该说共产党是在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抗日战争丰富的实践、洗礼中完全成熟起来的。这显著地表现在：（一）从抗日战争的当前实际出发，反教条主义，反关门主义。教条主义只知道背诵本本，用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门主义不要群众，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它们都对革命产生过极大的危害。反对教条主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各项方针政策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反对关门主义是要走出狭隘圈子，使自己成为全国性、群众性的大党，与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去战胜敌人。教条主义尤其害死人，看上去它似乎只涉及思想理论领域，实际上关系到抗日战争现实斗争的所有方针政策。敢不敢大胆地去反对、克服它，是中国革命能否前进的一个关口。1942年至1945年一直蹲在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巴·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里，记下了他对整风运动、反教条主义等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向莫斯科作报告。他认为反

教条主义，就是要“否定王明”，反对中国的国际派。“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像高尔基描写的某个叫费道尔·邓恩的孟塞维克一样。中国共产党反苏反布尔塞维克^①。这些丝毫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完全错误的观点，显然不止反映了弗拉基米洛夫个人的观点。整风运动着重总结了反对主观主义即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又推动了它的深入。（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如何对待它，关键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是否要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强调指出，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是在一定原则纲领基础上的合作，不是无原则的行动。否则“统一”会成为阶级投降主义，最后成为民族投降主义。不顾国内国际的压力、干扰，共产党制定和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陈绍禹在抗战爆发后三个月回到延安。他提出一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所谓“一切经过”，也就是要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如果这样办了，共产党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有的研究著作上说，陈绍禹的主张出于斯大林的指示。虽然书上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但合乎事实。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都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不应该讲独立自主。他那时只

^① 《延安日记》，第203、276—278、354—355、507页。

看重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看重共产党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有错误的了解。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看法才有改变。前面提到的《延安日记》上，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叫做“国际策略”。《日记》上认为毛泽东虽然投票赞成统一战线，而又强调独立自主，这是“千方百计要使统一战线解体”^①，破坏“国际策略”。说穿了，所谓“国际策略”也就是斯大林的主张。1948年斯大林同南斯拉夫卡德尔的一次谈话中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我们认为中国起义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该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这里的时候表示同意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回国后做的却是另外一套。他们集中力量，建立自己的军队。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正在打败蒋介石的军队。现在，就中国来说，我们承认我们过去是错了。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②。这条材料的真实性无可怀疑。谈话只说到了“战后”，实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也是这样。1944年以后，美国又参加进来“重新调整”中国政治力量。美国代表赫尔利劝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办法是“你先交出军队给我，我就给你以民主”。这是要彻底取消共

① 《延安日记》，第262页。

② 罗津斯幕：《中国历史》，下卷，第212页。

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最后也消灭共产党。赫尔利先向共产党试探，不能得逞以后，又宣布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1945年7月，新华社连续发表评论，指出赫尔利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将给美国政府和人民造成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国民参政会章伯钧等六参政员这时访问延安。据记载，毛泽东对章伯钧、左舜生说：“蒋先生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我这几条烂枪，既可以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先把赫尔利赶走再说”。毛泽东更直接对美国人指出：“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①。排除国内国际的压力干扰，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党由此得以牢固地立于不败之地。（三）党的革命理论的完善和系统化。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分别写了不少东西，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作了分析。但那时，党或者处在幼年，或者面临紧迫的军事斗争，他们不可能更深入地去从事理论思考。抗日战争开始，共产党必须对全国人民公开地系统阐明自己的纲领、政策，回答中国革命究竟应当如何前进，由谁来领导，抗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32—1133页。

日战争的前途如何等问题，并进而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道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代表了共产党人这时的思考。这些论著全面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这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它们的论证是有力的，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人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水平，也回答了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关心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党的革命理论的完善与系统化，汇集到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共产党在抗战中完全成熟起来，又领导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的结局。

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一些论者不以为然。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和主要军事力量。在国际上蒋政权是代表中国的。正面战场在战争中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那里并没有共产党的力量起作用。国民党固然指挥不了共产党，共产党更指挥不了国民党。还有，认为共产党领导了抗日，也就相应地应当认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蒋政权的反动腐朽等等，共产党负着重大的责任，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领导下面。所有这些都说明，蒋政权对抗战起了领导作用，怎么能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呢？

到底谁领导了或谁没有领导抗日战争，应该集中到一些经过历史检验了的实质性问题上去认识。首先，这里说的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指的权力结构形式、组织指挥系

统、国际上承认与否，更不是说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作用，国民党没有起作用。从那些方面去论证，固然形式上可以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战，但却无法说明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政权怎么转变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了；抗战中存在的内战、分裂危险，何以终于避免，使抗日坚持下来了，国民党抗战期间政治地位何以衰落下去，共产党的力量何以反而迅速壮大了？它们是抗日战争中一些根本性问题。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日，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里说的共产党领导，是讲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政治领导并非空谈，是以一定的有组织的力量为依托的。组织力量的增长有一个过程，政治领导力量的充分发挥也有一个过程。从这方面来看，蒋政权从参加抗日到坚持下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变化等一些根本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说明了。第二，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条是共产党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又一条是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者赞成自己的主张、行动。共产党争取和实现了这两条。国民党对前一条无法制止，对后一条不敢实行。不敢和不能依靠抗日主力军农民和广大群众，就无从谈得上领导权的问题。一不领导工人、农民，二不领导革命民主派，除了自己领导自己，还有谁要由它去领导？第三，共产党固然指挥不了国民党，但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迫

使后者不至于和不敢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这一条也完全做到了。“皖南事变”发生，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L. Currie)来探询情况。蒋介石对居里说，中国抗战，一为抵制日本侵略，一为阻止中国“赤化”。蒋介石把抗日、反共两件事并列，表明他深知在人民觉醒、共产党强大存在的情况下，抛弃抗日口号，专打内战是必定行不通，要遭到灭顶之灾的。没有共产党的又联合又斗争，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妥协投降危险受不到阻止，历史就只能在新的形式下走老路，重演反侵略战争中途夭折的悲剧。第四，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地位，一般说，它们同样重要，相互支持。前者国民党控制着，后者共产党控制着。认为正面战场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却缺乏分析。事情倒应该从相反方面去看待。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所受日军压力必定成倍增加，困难自然大得多。但依靠人民群众，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就无法独立维持。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对敌作战的前线，顶住近半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把敌人“以战养战”的资源，变成了对敌作战的资源；把敌后广大的人力由敌人可以驱使的后备军，变成了抗敌的前沿部队和后备军。没有敌后战场，这一切都投到正面战场上，对那里增加的压力就不是一两倍问题。照此看来，敌后战场极大地保护了正面战场，蒋介石国民党才保住了相当地盘，并赢得了争取外援的时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的力量，又直接转化为政治力量，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因此更

增加份量，不能被轻视。要证明共产党没有起领导作用，就要证明它在敌后战场上没有力量。那必定是徒劳的。最后，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战，那它就应该对国民党的政治反动、军事失败负责的问题，前面讲过了，我们说的领导并非指组织系统、权力结构等，大家也知道，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党彼此都不能指挥。提出它们之间谁对谁负责的问题，前提条件就不存在。如果一定认为凡属提到领导了，归谁负责，必须弄个水落石出，那么，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战，国民党就担负着双重的责任：消极抗日、军事指挥无能，和积极反共，没有把共产党反下去，给自己后来被推翻作好了准备。前一半确实存在责任问题，后一半追究起责任来，等于说国民党领导共产党来打倒自己，领导不力，这正像说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反共一样，岂不太滑稽了吗？说谁领导就应该谁负责，没有实质内容，不成其为否定共产党领导了抗日的理由。对上述各点，无论分别去看或者加在一起来看，都说明共产党争取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无可置疑。

中国共产党的变化——由小到大，飞跃发展。早期的党现在成了完全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了。

再看看中间阶级，中间势力的变化。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主张抗日，要求民主，以前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压制、迫害。抗日战争的大

地震在他们身上迅速反应出来。他们主张“拥蒋抗日”，发动民众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但对抗战由谁来领导，民主如何才能实现，多数寄希望于蒋介石国民党，少数人同情共产党的主张。蒋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后，政治愈加反动。1940年至1941年初，沈钧儒、沙千里被诬以准备在重庆暴动的罪名，由军警监视。马寅初因抨击国民党，被捕入狱。生活书店遭到封闭，邹韬奋出走香港。沈钧儒、章伯钧、史良的参政员资格，也由国民党公然宣布取消。中间阶级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对立加深，斗争尖锐化。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认识，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不要中途妥协，结束一党专政。1941年3月，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到了新的联合行动的阶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所有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联盟。它的内部左中右分立，由于一部分大学教授、青年知识分子加入，进步势力渐占优势，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成了共产党的有力同盟军。

中间阶级、中间势力的变化——活动分子人数从少到多，经过分化，政治上由中间走向靠左。这个力量兴起，并且向左转变，它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不能只看到那些有组织的活动分子的行动，更应该看到他们背后的社会潮流所向。他们的变化从社会生活一个较高的阶梯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从蒋介石国民党到中间阶级，在抗日战争大地震中发生的异常反应，重大变化、同时亦即它们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向我们指出，必须从新的角度全面加以理解。

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居于第一位，国内阶级矛盾居于第二位。抗日战争一天没有完结，这种矛盾的位置就一天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对外抗战的意义与国内阶级关系、政治势力变动的意义，也只能照这种顺序去排列，即对外战争的意义、重要性居于第一位，国内阶级关系、政治势力变动的意义、重要性居于第二位。必须分清它们是不同的两件事，并不存在前一种位置决定后一种位置的逻辑顺序。把它们混淆起来了，我们就不能了解抗日战争的全貌，不能认识抗日战争怎样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键。抗日战争的八年，有两个过程，两种演变，在大致同步进行。一个过程，一种演变，主要是表现为战场上的，是在中日双方之间进行的；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主要是表现为政治斗争的，是在国内几个主要阶级，社会势力之间进行的。两种演变中间，有一条明白的界线，但它们又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着。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要把抗日作为一个直接目标。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说明他尽可消极，但不能摘掉抗日招牌。共产党极力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反共军事进攻严格限于自卫。所谓“何（指何应钦）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是把抗日作为大前提

的。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斗争，说明它们又都不只抱着抗战一个目标，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国民党坚持积极反共，目光完全在“抗战以后”。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重在防止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目光当然也在看着“抗战以后”。因此，我们对抗战八年中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不能只看到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这个过程，这种演变。它只是历史事变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同时看到国内各阶级、政治势力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由政治地位上升到下降，由一度比较得人心到后来大大丧失人心；与此相反，共产党和中间阶级、人民群众的实力，由小到大，由幽谷上升到乔木、到山巅这个过程，这种演变。它是历史事变的又一部分。抗日战争中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都是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关系中国历史前途的头等大问题。一个民族矛盾，一个阶级矛盾。前一个关系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后一个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问题。民族矛盾，即亡国与否的问题解决得越好，阶级矛盾，新旧中国的问题就越有条件去得到好的解决。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反过来也是一样。共产党的力量发展了，它是在广阔沦陷区域里，从敌人手中夺回中国土地主权，因而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发展的；国民党的地位下降了，它是在敌人进攻面前，保存实力，因而失去人心的。抗日战争中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就这样又和“抗战以后”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

党努力抗日，中国人民力量的迅猛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得以保持下来，把不亡国的问题解决了。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问题，这时强烈提出来了，没有解决。它似乎还是数学上的一个未知数，但是这一道题就像已经列出的一元一次方程，只需要求解了，而且总是可以解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位置，与抗战时期国内政治力量的大变化，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存在逻辑顺序关系。倒是相反，决定两种演变结果的，是同一个事物，即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力量的蓬勃兴起。抗日战争的大地震，引发了中国内部人民群众与统治者的力量开始交换位置。

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中国走进社会主义

铁与血交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结束，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最后斗争，立即拉开了帷幕。它的斗争场面、内容是新的，双方的阵容是新的，又是老的。这就是历时四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立、区别，一个在有没有民族独立，一个在有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中国近百年来的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痛苦，其最后根源，就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低

下。新中国就必须是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一个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国家。实现这两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不能再有其存在余地。中国的社会就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下解放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抗日战争胜利了，新中国所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症结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有过的带着革命性的一面，这时不再存在了。它只剩下了并且大力强化了原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关于民族独立，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大力挤进中国，政治、军事势力飞速膨胀。对日战争一结束，美帝国主义就开始进入实际上代替日本统治中国的角色。抗日战争以前，美国在中国的实力地位显然远远地落在日本后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日本侵略者作战，如今变成了在美国出钱出枪支持下，向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实行“戡乱”。它凭借美国的支持，也就乐于把自己纳进到了美国控制中国、争霸世界的全盘战略计划里面。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时和抗日战争以前一样，是同外国侵略势力站在一起，压迫中国民族的，而不是充当中国民族独立代表者的。它所统治的地区，照旧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群众的潮流，由拥蒋抗日，翻转过来变成了反美反蒋。关于人民民主自由，中心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为基础，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面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当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里面所提出的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纲领部分，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完全破产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共产党表现了强大的领导力量，中国不可能建立一个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日本投降一宣布，共产党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准备与国民党合作，从事国家的和平、民主建设。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蒋介石表面也承认以和平、民主、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他坚持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蒋介石也要和平合作，那必须是一切归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和平与合作。蒋介石国民党只许存在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中国，绝对不容许它变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在论述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纲领中，再次强调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必要。他说，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其中就包括保证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

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①。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两条不能实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条件、环境也落了空。

新中国与旧中国决战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统治了中国 22 年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被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中国在经过短时间的经济恢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伟大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篇章。

讨论到这里，开头我们所说的抗日战争给中国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它的具体内容，现在就全部显露出来，让人一目了然了。

新中国代替旧中国，是由于它首先存在一个新中国的前身。这个前身，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并成长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所施行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政权组织、经济文化设施。抗战开始后，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年努力，取得了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地位。国民党以前从来不承认与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了。这表现在抗战一结束，国共两党立即举行了平等谈判。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的群众中间，还有一些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中间阶级、中间力量中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对国民党已经不抱幻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人心向背的转移，表明了力量重心的转移。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但传播于中国，也传播于世界，尤其受到一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058—1061 页。

只脚踏进了中国大门的美国的密切注视。抗战后期，美国在华“观察家”们一再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最有朝气之力量”。“中共终将获胜，似已无可疑义”^①。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政治影响，完全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并牢牢建立的。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有了1亿人民，10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些解放区北起长城内外，南至海南岛。他们是从抗战开始时只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只有3万多人武装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起来的。1亿人口，100万军队，200万民兵，空前地改变了与国民党实力的对比。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没有新中国的名号，完全具备了新中国之实的资格。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指出人民奋斗的目标和前途，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就是这样的政治纲领，指导群众奋斗的文献。抗日战争的八年，是历史为争取新中国到来做好了全面准备的八年。这就使蒋介石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一年多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便由防御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反攻，而且这个反攻真正成了蒋介石22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成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同时，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到，在抗战期间，并非单单共产党发展了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国民党同样也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具体指出了新中国的蓝

^① 《中美关系》白皮书，第64页。

图，蒋介石则更早就在《中国之命运》里规定好了旧中国的前途，他并且紧接着那部著作又出版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问答》，要求每个中国人要像封建时代对待“圣谕广训”那样，应以“座右铭态度”加以对待。结果历史判定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旧中国，而是人民的新中国。这就更加值得深长思之：民族要独立，社会要发展。只能顺应，不许违逆，顺应者繁昌，违逆者灭亡。当然谁也没有说，抗日战争把一切都给共产党、中国人民准备好了，只等新中国像鼓足风帆的航船自行驶过来了。其他且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并且领导着强大武装的，这样的情况不只中国一家。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希腊等国也同样如此。在欧洲，希特勒刚一被打垮，意大利、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很快解散，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被英国反动将军斯科比（R.M.Scobie）所血腥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全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捩关键。各国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中国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勃然兴起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世界历史转捩关头，不以最大的革命胆略，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办事，那时出现的将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仍然存在两种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布中国各革命阶级再接再厉奋斗了110年的民主革命，以彻底的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推进中国历史前行的步伐，就到此为止了吗？没有。它没有止步，也没有把速度放慢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它们

要分做两步走。但在第一步中，抗日战争跨越的难度很大，第二步也就紧跟着迈过来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民主革命一经完成，经过短期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中国历史又进到了社会主义。从政权性质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表示着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开端。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规定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规定性。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明确规定“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这种快速行进，关键仍在抗日战争。现在 we 不必去叙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也不讨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条件等等。我想只简单说明一下，人们可能产生的这样一个发问：中国缺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人又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新中国为什么不多用一些时间走新民主主义，而要很快改造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问题不取决于谁的主观愿望，而在历史进程的客观现实。民主革命完成，中国向何处去，可以选择的余地不多。一种选择，共产党放弃领导，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加任何干涉。它的结果很简单，那不会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卷土重来，中国再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谁也知道，这绝对不能允许。再一种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加强限制，发展“不操纵国

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在本国重工业基础薄弱和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很显然，那样的资本主义不会很快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经过一定时间，工人、农民与资产阶级必然造成复杂的矛盾斗争，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以至要重新大力来解决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立。那两种选择，或者不允许，或者得不偿失。剩下的一个选择：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能够比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唯一走得通的道路。而且中国经过长时期的革命斗争，现在把它提到实行日程上来了，谁要阻挡也阻挡不住。所以说，这不是凭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支配的。它不过体现了历史的前进趋势，必须顺其道而行之。

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大略总计一下，情形是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历时两年又三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三段，共一年三个月；中法战争一年四个月；八国联军十一个月；1904年英军进攻西藏地区八个月。日本单独发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日军占领台湾、再次进兵山东、“九·一八”至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共二年又三个月。把它们全部加在一起，共八年八个月。抗日战争连续八年一个月。在时间上相当于前面所有那些战争的总和。战争规模，外国侵略军深入中国领土的情况，抗日战争就不知超过以往历次战争多少倍。抗日战争要造成中国深刻的社会变化，就为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80年的牺牲奋斗，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以前斗争了16年，

屡起屡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四年，中国一举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紧接着又跨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关。在近代历史上，抗日战争以前，每一次革命斗争、爱国运动都有它的一定地位或很重要的地位。论它们推进历史车轮的功绩，却找不到其中哪一次足以比得上抗日战争的显赫辉煌。

在作过上面的论述、比较以后，我们从抗日战争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它来自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就是爱国主义。这是第一条。抗日战争并行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种是日本侵略势力从进攻到失败的演变；一种是中国内部人民力量由小到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势力由升高到衰落的演变。两种演变不但过程相近，方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动势力衰亡，进步势力兴起。弱的战胜强的，新的代替旧的。这是第二条。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结果新中国战胜旧中国，同时又加速了中国历史迈进社会主义。这是第三条。20世纪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和17—18世纪出现资本主义一样，表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向。它们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社会主义是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的必然结果。只有这条道路是中国唯一行得通的道路。事实证明它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还将要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第四条。

49年前，武汉举行群众大会，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年逾古稀的老翰林张一麐致词。他说“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还要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我只想补充一句：“七·七”以来的5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我们仍然应当记住那个光荣的日子，永远竖起自己的脊梁。